

# 为什么不能忘记凯尔泰斯·伊姆雷?

□符晓



如果凯尔泰斯·伊姆雷还活着,他今年应该90岁了。这位匈牙利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便是在匈牙利,也只是一位籍籍无名的作家,这本身就形成了文学史的某种张力。伊姆雷1929年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14岁就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后转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战”结束后回到匈牙利开始从事记者、工人和翻译、自由撰稿人等工作,创作了《无命运的人生》《寻踪者》《惨败》《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祷告》《英国旗》等中长篇小说和《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被放逐的语言》等日记和散文集。对于伊姆雷来说,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生中,作家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职业而已,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声誉。如果说是瑞典皇家学院在2002年“发现”了他,并不为过。颁奖委员会对他最重要的评价是,“刻画出了脆弱个体在对抗强大而野蛮强权时的痛苦经历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这些集中体现在他的“无命运三部曲”中。

《无命运的人生》是一部写成在1973年但却迟至1975年才出版的小说,看上去是伊姆雷的自传。小说以14岁的犹太少年柯韦什·久尔吉为中心,讲述了他上班路上被抓到集中营,先后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蔡茨集中营的经历,作为幸存者,他得以重归故里,可是却发现故乡已经面目全非。这是一部超越不动声色掩卷之后却使人非常沉重的小说。一方面在于小说描述了即便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也无法承受之重的集中营生活:单调、无聊、空虚、苦闷、恶劣,成为集中营生活的均值,满足并超越了读者对集中营的所有想象;另一方面在于小说强调了犹太人或匈牙利人等被歧视或侮辱人种的身份缺失,小说中一再有意提及的“黄星”事实上是这种身份缺失的象征,以久尔吉为代表的犹太人被应然地区别对待,本身就是人种所共知的深重的侮辱。吊诡的是,《无命运的人生》并没有像一些史书和其他大屠杀小说那样呈现出太多极端的恐惧,伊姆雷选择了一种比较巧妙的《美丽人生》式的叙事策略,将叙事视角限定在一个14岁少年身上,将叙事时间限定在“准现在时”,并大量运用“陌生化”的手法,延迟主人公和读者对集中营及周围苦难的知觉,产生了



某种日常和朴素的“零度”写作效果。

《惨败》创作于1988年,是一部几乎和《无命运的人生》完全不同的小说,共有两个部分。上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位中年作家在逼仄和嘈杂的工作环境中不停创作,写就了一部关于奥斯维辛的小说,却遭到出版社的拒稿。他勇敢地面对“惨败”,最终创作出一部题为《惨败》的小说。下半部分是作家所创作小说的全部内容:一位名叫柯韦什的记者失去工作,辗转于报社、工厂、军营等地,不断地面对人生的“惨败”。这部小说意在说明,一部描写奥斯维辛的小说至少在战后的匈牙利是不受欢迎的,这在柯韦什的生活经历中得到了确证,比如“制服”的狱卒实际上就是极权制度的象征,他的其他活动也受到了极权的限制,“屈从”成为他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唯一资本。在伊姆雷的这部小说中,集中营、犹太人和大屠杀的历史叙述因为制度使然已经成为不可能,事实上这也是伊姆雷自1970年代以来需要面对的匈牙利社会现实。从艺术上说,《惨败》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书中书”的嵌套结构讲故事,看似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共同完成了同一个文学叙事,使读者在经历双重阅读体验的同时不断勾连二者之间的联系。另外,在技术上,作者对很多句段都做了必要的补充说明,实括号代表小说人物的内心独白,圆括号代表叙事者的思考、判断和补充,无形中加强了小说的复杂性。

《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祷告》讲述的是战后匈牙利知识分子拒绝生孩子的故事,但与其说“讲述”不如说主人公在自说自话,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主人公关于生活的日常,“我”几乎用了一部小说的篇幅证明不要孩子的“政治”正确。“不要!”作为符号出现在每一自然段的开始,成为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为什么“不要”呢?是因为“我”曾经受到大屠杀和作为犹太人的伤害,对集中营有着惨痛的经历和记忆,推而广之,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所以不希望孩子也如世人一样被“胁迫”,并忍受人生的悲苦与无意义。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又充满矛盾,之所以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就是因为虽然“我”抵制孩子,但是对生命也怀着某种尊重与虔诚。《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祷告》与前两部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部小说全篇用意流小说和内心独白的手法,以“我”的思想和意识为中心叙事,堪称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在匈牙利的翻版,拓展了伊姆雷小说形式的边界;而且,在这部小说中存在大量的“哲学”叙事,作者不单用事件证明“不要”的可能性,同时还在小说中言说了大量的哲学和形而上学思想,说明“不要”的必然性。

这3部小说共同构成了“无命运三部曲”,几乎建立了伊姆雷大屠杀小说的写作支点,从时间的维度上,3部小说分别象征了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即作者生活经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当下如何以及又将发生什么事,成为小说作者30年间都在思考的问题。此外,伊姆雷的其他几部小说也都指向集中营、犹太身份和大屠杀等问题,比如,《英国旗》用一种亦小说亦诗的意识流手法讲述了从集中营出来的“青年克维什”在1950年代的灰暗时光;再如,《寻踪者》中主人公一心想追寻集中营旧址却以失败告终,

这些小说共同构成了伊姆雷小说的轮廓和精髓。需要说明的是,他的两部日记体随笔《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为理解“大屠杀小说”提供了注脚,除了不时言及这些小说创作的初衷、思路和指向外,更将他早期翻译过的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霍夫曼斯塔尔、约瑟夫·罗特、卡内蒂和施尼茨勒等人尽情呈现出来,并时不时地向卡夫卡、加缪和马洛伊·山多尔等人致敬,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思想和哲学依据。这些都说明,伊姆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家,他的经历、创作和思想,文学史和读者都不能忘记。

那么,究竟为什么不能忘记伊姆雷呢?

一是因为不能忘记文学和历史上的“集中营”和“大屠杀”,而伊姆雷正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就历史而言,无论如何大屠杀都需要被铭记,可事实上确认、承认、记住大屠杀却经历了甚至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美国,大屠杀从“无”到“有”也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在欧陆,对大屠杀闻所未闻者也不在少数。如《船夫日记》所述,伊姆雷重回布痕瓦尔德时,发现“年轻人对这一切都毫无兴趣,后面有对情人正在旁若无人地接吻”,这并不是后人该有的态度。伊姆雷的回忆和他的小说一道提醒读者和后来者,没有理由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就文学而言,“大屠杀小说”理应成为一种文学流派而被重视。自19世纪以来,英国的“贫穷”、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卫国战争”已经成为文学创作重要的“集体无意识”主题,假此思路,以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为中心的“大屠杀小说”创作实际上延续了这种传统,可以成为东欧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上新的“风景”,而伊姆雷正是这“风景”的重要一端。

二是因为伊姆雷的小说在形式上凝结了很多19至20世纪欧陆小说的艺术特征。伊姆雷谈不上是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那样写“传奇剧”的作家,他的小说虽然是在讲故事但情节性不强,但这并不影响他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无命运的人生》充分运用写实的手法真切地还原主人公在集中营的全部精力,已经真实到读者无从知晓内中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是作者虚构的,足见伊姆雷的“现实主义”功底。同时,如《英国旗》和《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祷告》等小说完全脱胎于意识流小说的笔法,人的内心世界及独白成为逻辑起点,用一种游离于作者之外的“心理”态度完成小说叙事,延续着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此外,在《惨败》中,全然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空间,那些具有实验性质的关于内心世界的括号解构了传统小说;而《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祷告》将很多事件进行了碎片化处理,又使得伊姆雷的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一位作家的每一部小说都超越前作并不容易,所以在形式上不断挑战自我就已令人钦佩,伊姆雷的小说间杂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甚至贝西埃所谓“当代小说”的诸多元素,实属不易。这也是文学史或读者不断回忆他的原因之一。

三是因为伊姆雷的大屠杀小说中洋溢着具有其自身独特性的哲学与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存在主义哲学对伊姆雷及其小说的影响上。在他看来,无论是“赤裸”被囚禁在集中营,还是未出生的

孩子降临人世,都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被抛”,“在而且不得不在”,所以他们的人生没有命运,等待他们的只有虚无而没有意义的存在,或者死亡,伊姆雷一直相信尼采的“不惜一切代价存在”,当存在也成为不可能,人们只能屈从于成为“牲人”。在“无命运三部曲”中,大屠杀幸存者的过去、现代和未来都止于“存在”,向死而生成为存在的唯一出口,这些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集中反映。另一方面,伊姆雷区别于其他“大屠杀小说”作家的重要表征是,他对大屠杀表现出了更多的冷静和沉寂。20世纪欧美文学中如伊姆雷那样言说大屠杀的作家不在少数,著名如美国作家埃利·威塞尔和被称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的普里莫·莱维,在他们的小说中,读者读到的大部分是恐怖、暴力、残忍和断裂,而伊姆雷的小说则选择了一种相对平静的笔触描写大屠杀和集中营,并更多的指向微小个体在强大权力面前的无能为力甚至逆来顺受,文本内容、作者情感、人物思想都是“零度”的,使读者于无声处听出惊雷,这是伊姆雷作为作家最重要的思想特征。

四是因为以伊姆雷为中心的东欧文学及南欧文学应该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读者和批评家的重视。晚近以来,囿于语言译介的影响,英语国家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接受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形成了稳定的读者群,然而受“时间距离”和销量市场所限,一些作家被有意无意地加上了本不该有的光环,或多或少遮蔽了读者视线。相比起来,对东欧和南欧文学的译介和接受情况显然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出版界和学界已经开始努力(如“蓝色东欧”丛书的出版),但是距离英语文学翻译数量的均值还是相去甚远。其实,无论是在“世界文学”还是在“文学共和国”的视域下,匈牙利文学在当下中国都不能被忽视,至少做到提及匈牙利文学人们想到的不止于裴多菲。何况,现代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希腊等国小说家的艺术造诣并不逊于英语国家,他们中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译介、被了解、被接受、被理解,才能扩大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边界。伊姆雷是他们中国的代表,但却不是唯一的代表,提醒读者不能忘记伊姆雷,也是在提醒读者,不能忘记东欧文学及英语文学之外的文学。

当然,任何作家都存在争议,何况伊姆雷是一位东欧中国而又被“偶然”“发现”的作家,所以对于如何评价伊姆雷,也要保持冷静的理性。一方面,不能因为他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将他奉上神坛,抛开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不谈,比之于20世纪已经被写进文学史的经典作家,伊姆雷的文学史地位不可谓高,国别、身份、经历和题材几乎都在限制他的创作;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他的读者小众同时未达到诺贝尔文学奖“推动文学的发展”和“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的双重标准就忽视他的成就和才华,因为文学史意义和读者反应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无论是在“大屠杀文学”的层面上还是在20世纪匈牙利文学的层面上,伊姆雷都足以成为扛鼎之人。西谚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对伊姆雷的评价最终还要交给读者,毕竟只有阅读才能使人更加理解伊姆雷,也只有阅读才能延续伊姆雷的文学生命,进而不能忘记他。

### 动态

近日,在32届莫斯科国际书展上,山东文艺出版社与俄罗斯东方图书出版社共同举办了彭学明长篇纪实散文《娘》俄语版的新书首发式。中宣部相关部门同志,山东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华,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刚,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李运才,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集团总编辑亚历山大·斯马拉阔娃,俄罗斯东方图书出版社副总编辑伊万努什金·谢尔盖等出席了首发式。

伊万努什金·谢尔盖表示,《娘》是一部十分感人且精彩的作品,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是俄罗斯东方图书出版社2019年重要图书出版项目之一。为了翻译该书,俄方特意请来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领域公认的优秀翻译家尤里·德利斯基先生作为本书的俄文译者。《娘》的精彩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围绕主人公和他母亲的动人的生活情节,另一方面是关于居住在湖南省西部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精彩描写。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仿佛能置身千里之外,亲眼看到湖南山区的生活场景、狩猎场景、田间劳作的场景,以及各种中国民间仪式和礼节。李运才就此俄语版《娘》的出版及两家出版社的首次合作表示祝贺。他介绍,截至目前,《娘》已被译介多个语种,除俄文版外,日文版、哈萨克语版、阿拉伯语版等均已出版,英文版也即将在美国面世。

随后,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集团向山东文艺出版社赠送俄语版样书。(冯晖)

##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阿拉伯文版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是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其中一卷,视野开阔,气势恢弘,展现了跨文化研究的一幅瑰丽画卷,也是文明对话和交流的重大篇章。出版后获得第4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6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被列入2017年度丝路书香工程资助项目。

中国和阿拉伯之间自古就有着友好交往。《史记》上就记载有条枝国(阿拉伯)。自唐朝以降,宋、元、明朝时期,中阿经贸往来十分频繁。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搭起了中阿文化、文学交流的桥梁。《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从纵横两方面论述了中阿文化、文学交流的情状。中阿古代至近代至现代都有文学交往,尤其改革开放后,中国翻译介绍了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阿拉伯对中国文学的介绍也可圈可点。同时,大量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也不断问世。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涉及小说、诗歌、戏剧、民间文学、文学史写作等诸多方面。该书对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纪伯伦、马哈福

兹作了专题介绍,对伊斯兰典籍《古兰经》中的文学成分也有介绍。该书不只是对中阿文学交流的梳理和总结,而是有一定的理论判定。这为我们继续探索两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交往打下了基础。该书还有阿拉伯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研究情况的介绍,其中,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化、文学交流的论述,可以促进中阿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阿语版由埃及著名汉学家、埃及驻华使馆前文化参赞侯赛因·伊卜拉欣与奈贾哈·艾哈迈德·阿卜杜拉

拉蒂夫联合译成阿拉伯文,将由埃及希克迈特文化投资公司、黎巴嫩蒂法福出版社、阿尔及利亚曼舒拉·伊赫迪拉福出版社、摩洛哥阿曼出版社4家出版社合作出版,同步在22个阿拉伯国家书店上市。

该书在致阿拉伯读者的前言中写道:我们希望在现有条件下,遵循“一带一路”、文化对话和交流方针,让中阿人民的友谊和关系更加巩固和发展,让中阿文化、文学交流更加发展和繁荣。(宋 闻)

## 《中国诗人辞典(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0世纪)》在俄罗斯出版

近日,由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俄罗斯著名中国文学文化翻译家、研究家克拉夫佐娃编撰的《中国诗人辞典(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0世纪)》,由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厚达700余页的俄文辞典收录了330位中国古代诗人辞条,时间跨度自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出现的战国时期迄于中国古典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是俄罗斯至今出版的收录辞条最多、内容最为详尽、系统、丰富的中国古代诗人百科全书,填补了俄罗斯国内中国诗人辞书出版的空白。

中国“诗学的发展进程”决定了这部辞典的“时间框架的界定”。克拉夫佐娃在辞典的“序言”中总结了战国、秦汉、六朝、隋唐时期的诗歌创作,认为“上述时期展现和形成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所有特征,它们既是通常所说的‘古典创作’,同

时也从各方面独立开来,包括它的体裁结构和诗体特点”。

辞条内容主要包括诗人生平简历、诗作和现代版本信息、诗词数、诗体结构、创作特点和代表作、中俄文参考文献和俄语译本等。辞典还另外附有100余页的“文献目录”和“参考资料”。“文献目录”包括“传统文献名称缩写表”“传统文献注释列表”“俄语翻译研究文献出版名录”“汉语文献及研究著作出版名录”“欧洲语言研究文献及辞典名录选”;“参考资料”包括“俄汉对照历史年表”“历史人物、神话人物、神灵注释表”“文学术语注释表”“社会政治文化术语注释表”“俄汉地名对照表”。称得上是一部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会不可或缺的数据资料工具书。(张冰)



法国画家埃德加·德加作品